



鲍尔吉·原野“万物有信书系”：

聆听万物的心语

□李雨轩

鲍尔吉·原野的近期“万物有信书系”包含三部书信体作品，分别是《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沙粒给云雀写信》和《喜鹊给麦穗鱼写信》，共收入150余封信件，可以从万物启迪、传统追怀、诗性语言三个方面解析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来自万物的启迪

作者构造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让万物相互诉说。写信者既包括动物、植物等生命体，也包括车辙、沙粒等非生命体。同时，写信者并非只有自然之物，也有火钩子、筷子、戒指等人造物。比如，作者正是借助火钩子的视角，描绘了牧民一家的温馨生活；又借助戒指和蝴蝶结的视角，刻画了牧区女性的坚韧形象。可见作者并非拒绝人事，而是希望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关系。

“万物有信书系”中的信件都是以两封为一组，有寄信也有回信，有疑问也有解答，创造了一种万物彼此对话的效果。正如高洪波在序言中所说：“这些看似天真的对话，实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精神交响。”从另一角度看，这些信件也有共同的阅读者——人类。人类通过这些信件，聆听万物的心语，领悟万物的智慧。面对螳螂提出自己喜欢梅花鹿，进而想要变成梅花鹿的想法，辣椒耐心地劝导：“你是独一无二的，当好你自己才是你活在世上的使命。”泉水在写给风铃草的信中说：“温柔是大自然赋予生命最坚韧的力量。是的，温柔不是退却，不是软弱。它是勇敢和坚强。”这些朴素的话语既令人倍感温暖，也给人启迪。

万物有灵的哲学基础和文学设定使本书系具有儿童文学的特点，不少语段富于童真童趣。太平鸟问落叶松：“你的落叶堆了一地，这是你给谁写的信？……你把信写好，卷成一根松针扔在地上，等收信人取来，是这样吗？”这种表达不但契合儿童的心灵认知特点，还与书系的核心形式——信件——形成了很好的呼应关系。

这种童趣与书系的思想深度并不冲突。在花大姐（瓢虫）写给刺猬的信中充满了求知渴望，她提出的问题就像“十万个为什么”；而刺猬在回信一些知识性问题的同时，也谈及了世界的根本法则：“世界从来没有永久的主人，我们都是短暂的过客……我们在这里呼吸，吃到该吃的东西，喝到该喝的水就够了，尽量不去打扰其他动物、植物。”这是对刺猬生存法则的表达，也启迪着人类应如何自我定位、如何与万物相处。

物种与世界的关系也提示了本书系至关重要的生态主题。作者揭示生态恶化、物种濒危的事实，提醒我们警惕可能发生的生态危机。《土拨鼠给闪电写信》是整个书系的首篇作品。土拨鼠向闪电控诉了外人对土拨鼠的屠杀，渴望闪电能够惩罚它们。这种情感是多么真实，但其寄托又是多么脆弱。在另一篇信件中，蝴蝶因被冰雹砸断了尾巴，写信给冰雹骂它。冰雹回道，冰雹在查干包冷地区的增多与地表的植被覆盖率和湿度降低有直接关系，是人类过度砍伐森林、采矿的后果。冰雹说：“大自然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大自然不会做错任何一件事。”这里的“对”并非一种价值判断，而是揭示了一种必然性和规律性，警示人类必须处理好草原地区生态与经济的平衡。



“万物有信书系”，鲍尔吉·原野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5月

细读“万物有信书系”，不难发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拟人化的万物是否真正能传达自身的想法？人类是否只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万物？这种质疑当然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难题。但作者努力立足万物各自的特性来构思，尤其是试图以自然本身的视角来观察自然。黑桦树在给风滚草的信中写道：“秋天到来，然后进入冬天。天道轮回就是这样，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也不会颠倒顺序。”这是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其中感受不到忧伤和惋惜，只有平静和淡然。作者努力克制自己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贴近万物之本然，以此回应了上述难题。

对传统的追怀与坚守

“万物有信书系”为何要采取书信体的形式？这固然是为了便于呈现万物的心语，但形式本身亦可表达意义。德里达在专著《明信片》中宣告了电信时代中情书的消亡。情书自然属于书信，情书消亡是书信消亡的一个表征，而书信消亡又是电信时代或数字时代的媒介整体变迁的结果。在数字时代大规模地采用书信形式写作，暗含着对逝去时代和生活传统的追怀。

书系名为“万物”，但作者似乎有意排除了那些数字时代的典型之物。我们在书中找不到手机、电脑写的信件。这或许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的一种审慎的距离感。麻雀和拴马桩围绕搬家到城镇展开对话。麻雀说自己对土房子有很深的感情，不愿搬离，拴马桩则担心家里那匹枣红马的未来。“马喜欢草原，喜欢奔跑，喜欢喝河里的水，不可能在镇里生活。”马和拴马桩都是游牧文明的典型凝结物，讨论马的归宿，也是在讨论整个游牧文明的归宿。鲍尔吉·原野是一位蒙古族作家，内蒙古的环境、地貌、风俗、

文化一直是他书写的重要内容。信件中反复出现的乌力吉木伦河、博格达山、巴丹吉林沙漠等，都是真实的地理存在。当然，书中也有很多虚构的地名，如万度苏草原，它们是作者的文思与内蒙古地理图景融合所产生的想象空间。

在地理风貌之外，还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书中的啄木鸟不断感应格萨尔王的召唤，不断追寻格萨尔王，这是对广泛流传于蒙古族的《格萨尔》史诗的礼赞；下眼皮所写的信件中还直接大段引用了《江格尔》史诗。作者对蒙古族的民族文化非常熟稔，也充满敬意，使其成为信件的互文本。黏豆包还在信中介绍了蒙古族的传统服饰，随后补充道，这是老年人的装束，年轻人则穿羽绒服。这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实则以小见大地展现了时代大潮中的坚守与变迁，透露出作者对民族传统消逝的惋惜。正如鲍尔吉·原野所说：“一个民族要管好自己的吃和穿，自己的马和牛羊，还要找到自己文化的传承人。”那些动人的信件中，饱含着他对蒙古族文化的深情和坚守。

对诗性语言的自觉追求

语言往往能形成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根本特色。“万物有信书系”突出的语言风格便是在素朴中呈现诗性，这些诗性渗透在信件的各处。风滚草写道：“夏夜，天空有多少星星，草原上就有多少虫鸣。虫子们唧唧叫着，像在跟天上的星星对话。”星星和虫鸣并无事实性关联，并且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声音，但作者巧妙地构造了二者间的双重关系，一是数量上的比较关系，二是主体性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的构造似乎改变了二者的性质，产生了灵动玄奇的效果。

在《蒙古栎树给勒勒车辙写信》中，作者写勒勒车辙不仅是为了写牧民打盐的历史经验和生活传统，也是为了显示车辙与长调之间的相似性。“长调落在草原上变成了车辙，长进草里”。这种联想在音乐和印痕之间建立了通感关系。枕头在写给雨水的信中写道：“酒也是水，他们暗中藏着火……酒里有神灵，遇到明火，潜伏在酒里的火跑出来燃烧。”作者在酒的内部构造了“水”与“火”的辩证统一。柏树在给榆树的信中写道：“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你别忘了，风会把我的气息吹到你那里，我也会在风里闻到你的气息，那时候我们就像见面一样，像紧紧拥抱在一起。”考虑到草原特有的干旱、严寒等气候条件，读者眼前似乎耸立起两棵未曾谋面却共同生存的大树形象，他们在恶劣环境下默默坚守，彼此眺望，相互牵挂。柏树对榆树的诉说毫不煽情，却令人无比感动。这些语言与日常语言有着较大的差异，是典型的诗性语言。勒勒车辙在给柏树的回信中写道：“亲爱的蒙古栎树，你的信像一首诗。尽管我没读过诗，但诗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作者将柏树的书信界定为“诗”，不仅是在诗歌与书信这两种文体之间寻找互文性，也试图借此讨论何为“诗”的本质，进而阐释自己的诗学观：只有自然、素朴、纯粹的文字才能形成真正的诗。在诗的背后，是一颗同样素朴、纯粹的心。

你有多久没有动笔写一封纸质书信了？让我们一起阅读“万物有信书系”，一起聆听万物的心语吧！（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评论

体察孤独 感知生命

评胡永红儿童小说《童年巴士》

□蔡玉明

《童年巴士》是胡永红继《我的影子在奔跑》之后又一部描写孤独症题材的作品，既延续了其对特殊题材的深耕，也在叙事维度与主题挖掘上实现了新的突破。不同于传统儿童文学的温情叙事，这部作品将叙事核心聚焦于离异家庭背景下、经历父亲意外离世的孤独症儿童，以童真视角触碰到家庭破碎、生命消亡等沉重命题，在童真的纯粹与世俗的复杂的对照中，深度叩问特殊群体的成长困境。整个故事线依托于孤独症最不擅长的“社交”来完成，对于作家来说，这是很有挑战性的艺术架构。

作品正文不足8万字，却以极具张力的叙事，将幻想与现实、机趣与温情、悲悯与力量融为一体，实现了“以小见大”的文学表达。文本没有冗余的情节铺陈，每一处叙事都服务于人物塑造与主题深化。正如有学者所言，“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依然，而小说的锐利是可以想见的”。作品不仅具备儿童文学应有的童真质感，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儿童文学的题材边界与表达局限，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

胡永红的创作底色，始终带着未被世俗磨平的童真。这份心性与她早年的编辑经历相融合，使得她的作品既贴近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她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对现实素材进行艺术重构，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多年来，她在创作中愈发性思辨，却始终保留着纯粹的童真，这种复合气质使其作品形成“层层有料”的文本肌理，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阅读中收获全新感悟。

从《我的影子在奔跑》的自叙体尝试，到《上学谣》的多物化视角，再到不久前获得第六届中国政府出版奖荣誉的《万物生长·一个人的营盘》的主题创新，胡永红的创作始终保持探索精神。《童年巴士》延续作者一贯的沉浸式自叙书写范式，全书以关键词串联各章节，贴合主角单一、线性的思维特质；文本借特殊心智视角与常规认知逻辑的错位构筑独有的审美张力，为当代文学的叙事手法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路径。

胡永红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探索文体和题材的边界，以实现充沛情感、丰富内涵和饱满信息量的表达，让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让沉重的命题变得轻盈。如书中第六章“空！爸爸去哪儿”以“回忆”的自叙形式，通过时空穿越，具象再现末末与爸爸的亲密相处和羁绊，既贴合人物特质，又实现了情感深度传递，令人动容，彰显了作者的叙事技巧与情感把控能力。

胡永红的儿童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质是成长性。这不仅体现在人物弧光上，更体现在文本内涵的多层表达上。她的作品尝试突破“儿童文学即低幼化表达”的刻板认知，“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的文本，如同一个多面体，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读出各自的感悟。这种“可携时间前行”的文本特质，正是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稀缺品质。

《童年巴士》以童真为底色，以思辨为骨格，既为读者打开体察孤独、感知生命的入口，也在主题表达与叙事手法上，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新思路。

（作者系《南方》杂志社原社长、广东省作协儿童文学专委会原主任）

动态

原创绘本“走出去” 蔡皋作品国际版权推荐会在京举行

6月17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在国家会议中心湖南出版展台举行了蔡皋作品国际版权推荐会活动。

2026年4月，湖南绘本文学艺术家蔡皋斩获国际安徒生插图画家奖，成为该奖项设立六十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创作者，标志着中国原创绘本文学走上世界童书最高舞台。蔡皋和现场来宾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故事。她说：“图画书的创作与出版是最让人幸福的行业。我和图画书一起成长，和行业一起成长。图书是我的道路，是我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毕生的向往与追求。”

据介绍，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从2015年开始出版了20余册蔡皋作品，打造了“蔡皋的绘本世界”“童心童谣绘本”“中国美丽故事”等产品线，并将其作品翻译成多种外语，输出到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贺砾辉表示，湖南出版多年来与蔡皋老师一路携手，希望让她的作品走进更多国家，走进更多家庭，为全世界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欢乐，也为文明交流互鉴增添新的光彩。

尼泊尔出版社苏门·普拉丹作为海外合作方代表发言。在他看来，蔡皋作品流淌的人文情怀能够超越文化差异，也期待把更多美好的中国故事带给世界。

活动现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党支部书记、董事刘星保，生命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原主席张明舟共同落笔签字，宣布正式成立蔡皋国际版权中心。此外，同期还发布了《出生的故事》的尼泊尔语、印地语、泰语等多语种新版本。

插图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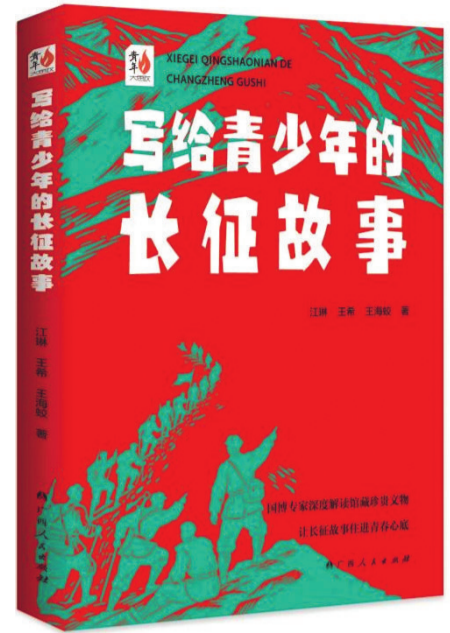
《出生的故事》插图，蔡皋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让文物照亮长征精神

《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创作手记

□江琳



《写给青少年的长征故事》，江琳、王海蛟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

对于当下青少年而言，长征大多还是课本里的历史知识，难以从文字上的历史事件走进先辈的心路，并真切感知那份生死考验与艰难困苦。很多孩子知道湘江战役、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的时间和事件，却难以体会雪山山上饥寒交迫的刺痛、草地上身陷泥潭的绝望，难以共情战士以血肉护信仰的赤诚。那些刻在史料里的艰难困苦，常因缺少具象的情感联结，没能变成触动心灵的感悟。

我们想为青少年撰写一部他们看得懂、看得透的长征历史书。不是复述一段教科书上的历史，而是要让新时代的青少年，通过一件件文物，看见那群鲜活的生命，如何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用双脚走出一条民族的希望之路。我们要让博物馆里沉默的长征文物“活”起来，用它们背后的故事，为当代青少年搭建一座通往长征岁月的桥梁。

近万件馆藏长征文物中选择用24件文物串联长征史诗，并非易事。而更难的是，在这二万五千里征途中，选出蕴含着精神光谱——信仰如磐、无惧生死、乐观坚韧、战友情深、军民同心的文物。在梳理文物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提醒自己：要站在青少年的视角，用他们能共情的细节，替代宏大的历史叙事；用有温度的文物，消解遥远的历史距离。伏案数月，长征中那些斑驳污损的地图、锈迹斑斑的武器、磨损破旧的衣物、字迹模糊的日记，逐渐借着文字，借着那些草路蓝缕、感人至深的故事，拥有了更多的重量和温度。

讲到长征出发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时，我们选择的是一件何叔衡送给林伯渠的毛衣。1934年秋，瑞金“苏区五老”中的何叔衡和林伯渠在长征出发前夜，把酒话别。见天气渐凉，被留在苏区的何叔衡想到林伯渠此去旅途艰难，便脱下自己身上穿的毛衣送给了即将远行的老友，以抵御风寒。林伯渠收下毛衣，心中五味杂陈，当夜即赋诗《别梅坑》：“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锦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这件毛衣，不但记载了长征出发前离别的愁绪，还承载着浓浓的战友情谊。长征出发后，担任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一路上筹粮筹款，保证部队的给养，经常提着一盏马灯为战友们照亮行程。长征的苦难没有摧毁他的意志。他在《记长征马灯》这首诗中，表达了对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心与乐观：“总是前进好景色，目标注定有南针。”

“革命理想高于天”，这在长征中不是口号，而是一种信念。因为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存在，一切磨难都能被自信和乐观征服，牺牲也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们在很多长征文物中，都能看到这种精神。我们选择用陈毅创作的《赣南游击词》表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历史。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他们栖身森林和山洞里。风餐露宿，昼伏夜行，随时准备抵御敌人的伏击。即使“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战士仍“勤学习，落伍实堪耻。此日准备好身手，他年战场获锦归。前进心不发”，诗词把严峻斗争形势和豪放的乐观主义精神统一起来，表达了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坚定立场。

这些文物中的故事，让长征不再是教科书上抽象的名词，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真实的事构成的生命史诗，是一首首充满精神力量的赞歌。

在整理资料时，捐赠者的故事常常让我们难忘。这些文物之所以能跨越近百年来到我们面前，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其中红一军团以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请来了黎平县农民高树清为部队做向导。高树清将部队带到路团村后，便住回走。直途中，又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气喘吁吁的他顾不上休息，再次带领队伍一直走到地西村。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暗，红军战士怕夜黑危险，再不要他引路。为了返程方便，还送给他一盏手提风油灯。这盏灯，高树清带回家后再没有舍得使用。当他捐赠给博物馆的时候，灯芯还停留在和红军战士分别时的那个瞬间。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和纲领、阐明红军的行动方向及要实现的目标的重要文件。它能保存下来，离不开布依族老人杨登凤不惧生命威胁的守护。1935年4月，红军长征来到了贵州关岭板袍村，村民都到深山老林里躲了起来，只剩下一位50多岁的老人杨登凤留守。怕打扰红军，红军夜晚在野外扎了营，天亮才进村。由于村中无人，也没有吃食，他们就喝了甜酒，还把银圆、纸票放在原来盛放甜酒的坛子里。他们给杨登凤讲解布告的内容，里面写的“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让杨登凤相信“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红军走后，老人悄悄地把布告揭下并藏在家中。地主勾结国民党军队前来追查，并以杀头相威胁，但老人始终守口如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将这长布告送到了博物馆。正是这份信任与赤诚，让久远的文物有了光辉，让逝去的岁月有了见证。当青少年读到这些捐赠故事时，便会感受到，长征精神的传承不仅在于铭记历史，更在于这份守护与传递的责任。

长征路上的英雄，既有叱咤风云的将领，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甚至还有“红小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年轻的红二十五军多是由红四方面军烈士的子弟或遗孀组成的“娃娃军”。他们在长征途中，虽屡遭重大挫折，却都没有减员，到陕北时，部队还增加了数百人；与党中央一度失去联系，也缺少策应，却确定了北上的正确方向，配合了主力长征。年幼的“红小鬼”以稚嫩的肩膀扛起了救护和后勤任务，跟成年战士一样，以难以想象的成熟和坚定，走完了长征路。

书中，我们选了一件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等字样的川陕苏区布币。它来自红四方面军12岁的“红小鬼”杨世才。长征出发前，他的母亲赶来试图劝他回家，但他坚定地选择跟着红军前行。他将布币留给母亲作为路费使用。1950年四川解放，历经长征路上的劫难，并在随后的枪林弹雨中存活下来的杨世才，几经打听才找到了母亲所在的楠木寺的小村子。那张苏区布币，作为对儿子思念的载体，她一留就是15年。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无数次被革命先辈的忠诚与信仰打动，被文物背后的细节与温度感染。我们努力让每一个故事都有血有肉，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生动，因为我们希望青少年读到的不是枯燥的历史，而是能与自己产生共鸣的生命体验。

和平时代的青少年，同样会遇到挫折与挑战，同样需要信仰与勇气。希望当他们感到迷茫时，想想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当他们想要放弃时，看看红军战士穿过的防滑钉鞋、吃过的野草；当他们享受生活时，不忘长征路上的艰难与坚守。希望通过这本书，让青少年与长征精神相遇，让文物背后的感动直抵心灵，让他们明白：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人生的意义在于担当。愿这些穿越近百年的文物故事，能成为照亮青少年青春征程的明灯；愿伟大的长征精神，能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指引他们走好人生的“长征路”。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儿童文学评论 第六四期